

香港理工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编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

翻译研究词典

(英) Mark Shuttleworth 著
Moira Cowie

谭载喜 主译
王克非 校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
香港理工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编

翻译研究词典

(英) Mark Shuttleworth 著
Moira Cowie

谭载喜 主译
王克非 校

其他翻译人员(按姓氏音序):

李建夫 李义丽 熊锡源
张齐颜 张莹 钟尚离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 01-2003-5473

© 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 1997

First published by St Jerome Publishing Ltd. Manchester, United Kingdom.

本书由 St Jerome Publishing Ltd 授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研究词典 =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 (英)沙特尔沃思 (Shuttleworth, M.), 考伊 (Cowie, M.) 著; 谭载喜主译.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7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

ISBN 7-5600-5019-0

I. 翻… II. ①沙… ②考… ③谭… III. 翻译—研究—词典
IV. H059-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0333 号

出 版 人: 李朋义

责任编辑: 杨书旗

装帧设计: 蔡 颖 韩晓梦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25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5019-0

定 价: 18.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总序

人们都信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翻译历来所为，正是搬运他山之石，雕琢本土之玉，或反向往外搬运，功效亦然。如今我们对关于翻译本身的研究成果，也系统地、成套地从西方加以引进，同样是抱有这样的借鉴他人、促进自己的愿望。这便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之缘起。

一、译丛选编的目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里，我国的翻译研究同各项事业一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单从发表的论文看，每年我国外语界在百余种相关学术期刊上发表外国语言研究类论文3,000多篇，其中翻译研究类论文占20%，即每年约有600篇左右的翻译论文发表。著作的出版也逐渐增多，近十几年间已出版翻译研究论著数十种。可是相比之下，我们对国外翻译研究的译介却很少，迄今仅有奈达（摘选）、卡特福德、斯坦纳（摘译）以及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等少数几家。通英文的研究者可以直接阅读大部分西方原著，但英文之外的研究者就不易读到或读懂这些翻译理论书籍。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翻译学科的发展。

西方翻译研究在近四十年里发展迅速，新论迭出，对其加以翻译介绍，无疑有益于拓展我们的研究思路，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二十几年前，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曾编辑了一本《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虽然是个小薄本，但其中评介了奈达、纽马克等多位国外翻译理论家的论述，令当时的翻译研究界和翻译专业师生耳目一新。该书堪称是“为今后做有系统的引进所作的一次初步尝试”（该书序言）；时隔二十余年，我们希望这套译丛能成为前人期盼的“有系统的引进”。

翻译在历史上有沟通文化、传播学术之功能，促进了各民族

的交流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因此翻译又有繁荣文化、启发创新之功效。尤其值得指出，翻译的一大价值是“内化外学”或如哲学家贺麟先生所说的“华化西学”：“使西洋学术中国化，灌输文化上的新血液，使西学成为国学之一部分”（见张岂之编《译名论集》贺麟之序，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我们不能只指望懂外语的人从外文了解外域思想。外域思想只有被翻译成本国语言文字，也就是说，本国的语言文字中已有词汇可以表达新的思想、新的概念，这种新思想新概念才真正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为我们所吸收，所运用，激发我们的研究。在我国传承千年的翻译研究基础上，借鉴西方现代翻译理论，或可使中国翻译研究的话题模式更为丰满。这就是我们选编这套译丛的基本出发点。

二、译丛的代表性与特点

这套译丛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当代的，所选基本上是近十余年间的西方翻译理论著作；其二是多视角的，而不仅是语言学派的，文艺学派的，或其他什么学派的，亦即有代表性。以拟收入本译丛的十本书来说，1）从语言学视角探讨翻译的有：*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话语与译者》），2）从语言交往功能方面探讨翻译的有：*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Translation in Systems*（《系统中的翻译》），3）综合性研究的有：*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描述翻译学及其它》），*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研究词典》），*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翻译研究：综合法》），4）从历史上看译者作为的有：*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5）翻译实践方面的有：*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口笔

译训练的基本概念与模式》)。即使同属语言学视角的研究,也有以认知、关联、话语、语用、心理等多理论框架探究翻译现象的分别。

三、译丛编译的几条原则

在基本确定翻译的书目之后,我们对全书的翻译处理和术语的翻译分别提出了以下几条原则。

全书的翻译:

(1) 忠实性原则。译文应力求忠实原作,表达顺畅,不得随意节译或改译;译毕应自校或请他人核校一遍。

(2) 统一性原则。对于可能出现的政治问题、无把握的词句,须另纸记录,标明页码、行数,附于译作之后,由主编统一解决。

术语的翻译:

(1) 透明性原则。即大致能从译文看到原文的影子,或者说多少能够从译文回译(back-translation)到原文;并尽量采取词典对等(dictionary equivalent)的办法,力图做到一词一译。

(2) 一致性原则。即同一术语反复出现时,除非因上下文不同而在概念上另有所指,一般应取一致的译法。

(3) 简洁性原则。即用最恰当、最简洁的字词移译源语中的术语。

此外还对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规定,如1)人名、非常用术语、地名、专有名词等,首次出现时,应在译文后括注外语原文,随文括注出处时的人名不译;2)原作注释和译者、校者注释均作当页脚注,在注释之后分别标明“原注”、“译注”、“校注”;3)原书书目不予翻译,直接附于译作后;4)原作所附术语、人名索引,可沿用;必要时可添加术语、专名等索引。

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本套丛书各译本的质量。

最后,我们感谢每一位参加翻译的同志的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感谢香港城市大学的朱纯深、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立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穆雷、中南大学的张

旭等朋友的关注和在选题上的帮助。同时,感谢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研究系翻译研究项目的帮助,以及外研社在出版上的大力支持。

翻译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文化交流活动,对这一活动的探讨构成了翻译研究的基本内容,也是各国各民族可以相互借鉴的基础。我们有选择地吸收国外有价值的翻译理论研究成果,相信一定会有利于我们自己翻译研究的深入。愿本套译丛的出版能对我国译学理论建设和研究人才的培养起到积极的作用。

王克非 朱志瑜

2005年2月

翻译研究词典的翻译原则与方法

本词典的原作者之一马克·沙特尔沃思在其序言中说, 20 世纪 90 年代是令翻译研究欢欣鼓舞的年代。此话不错。实际上, 现代翻译研究领域已不止一次地出现了这种令人“欢欣鼓舞”的情形。例如, 笔者曾在《翻译学: 作为独立学科的今天、昨天与明天》一文(《中国翻译》2004 年第 3 期)中谈到, 就西方而言, 自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以来, 翻译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两次大的飞跃。而每次飞跃出现之后, 又都引发了人们在随后年代对于翻译研究领域的较大规模的探索 and 开发。从 50 年代至 90 年代, 再到 21 世纪, 可以说每个年代毫无例外地都产生了“令人鼓舞”的翻译理论成果和代表人物。

虽然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以来, 我国的翻译理论建设过程中也同样出现了两次具有较明显标志的飞跃, 但就理论发展的规模和研究成果的数量及其影响来看, 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在较多领域领先于我们,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不必讳言。其中一个重要领域, 就是翻译术语的发展领域。当然, 我们不能说中文的译学术语如何如何贫瘠, 而西方语言中的译学术语就如何如何发达。例如, 在中文译学术语中, 就有不少是西方译学术语体系中所并不存在的, 或至少是一些西方主要文字如英文所无法在语义上逐字对译的: “死译”、“乱译”、“胡译”、“抢译”甚至“活译”即是信手拈来的几个常见例子。但毋庸讳言的是, 在迄今为止的当代翻译研究领域, 频频出现的新的译学术语, 绝大多数都源自西方各

个主要语言当中。例如,无论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时下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新鲜”甚至“稀奇”的术语如“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形式对等”、“等效”、“等值”、“读者反应”、“释义模式”、“交际翻译”、“语义翻译”、“翻译功能”、“翻译目的”、“翻译操纵”、“文化再释”、“文本改写”、“译本接受者”、“翻译赞助者”等等,它们不是来自英文,就是来自德文、法文甚至俄文。而新创的术语,毫无疑问地伴随着新的概念和新的思想。即使是由于某些术语过于“新奇”或其文化负载过于独特而无法全盘进行语际转移,但它们背后的概念和思想却往往是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特性的,或至少对不同语言文化中的译学传统是有所启迪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因如此,把马克·沙特尔沃思和莫伊拉·考伊合编的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翻译成中文,对于一个善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现正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古老而新兴的译学体系来说,一定是一件既具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值得花力气来做的工作。

本词典原版由英国圣哲罗姆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书中共收词条400项,绝大多数为20世纪40年代末、尤其是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领域所创造或采用的专门术语。词典主体除了由原创英语译学术语构成之外,还包括一些译自德语、法语、俄语等其他主要西方语言的重要术语或概念。因而可以说,它不仅代表了英语世界现代翻译研究领域中术语建设的最新面貌,而且也较充分地反映出了整个当今西方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学科发展的最新状况。对于这么一部工具书的翻译,我们必须采取十分谨慎和严肃的态度,绝不可草率为之。我们的出发点是,虽然我们并不希望也不可能使我们提供的各个译名成为唯一的中文版本,但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吃准吃透每一个词条的原意,使译文既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出源术语的本来面

目,同时又特别在词条定义和解释层面具有较好的可读性,从而力求尽可能多的术语译名能成为合理而易于接受的译名,或至少能为最终达到外来译学译名的统一而增砖添瓦。

这是本书翻译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总原则。在这个总的原则之下,我们还确立了若干更为具体的指导原则和方法。为了确保各个原则和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使翻译质量有较好的保障,我们在词典翻译的准备阶段采取措施向国内译学界同仁广泛征集意见。其中尤其需要在此提到的是由本套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主审王克非、朱志瑜专门为本词典翻译征集意见而组织的两次讨论会。

这两次讨论会规模虽小,但对我们翻译工作却有很大帮助。会议分别于2003年4月12日和15日在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举行,参加讨论者除两位主审、本书译者谭载喜、李建夫外,还邀请了在香港工作或学习的部分翻译理论界同仁:朱纯深、穆雷、张旭、李德超等。会上就事先派发的、由主译谭载喜提供的400余条翻译研究术语的汉译名称统一问题,以及相关的翻译原则和方法问题,逐条进行了认真、细致甚至相当激烈的讨论,对绝大部分术语的翻译问题达成了初步共识。张旭当时作为会议秘书,事后还对讨论会的录音记录进行了整理,撰写了一篇有关讨论的文章。

下面我们着重谈谈此次词典翻译所遵循的几条具体原则和方法。简言之,我们所遵循的原则以及具体采取的翻译方法,就是“准确、透明、一致、简洁、通达”十字方针。所谓“准确”(accurate),是根据源术语的实际用意来翻译,不掺入或尽可能不掺入、或少掺入译者根据目标语表达习惯而获得的意义。所谓“透明”(transparent),就是保证上述“准确”原则的操作性原则,是指译文读者能根据译文看到原文的影子,也

就是说读者或多或少能从译文追溯或回译到原文。所谓“一致”(consistent),是指考虑到相关术语的反复出现,它们的译法除非因其语境的不同而不同,否则前后均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翻译中尽量采取词语对等的办法,做到一词一译。所谓“简洁”(concise),就是用最恰当、最简洁的字词去移译源语中本来就很精炼的术语,使翻译过来的术语如同源术语一样,看上去像术语。所谓“通达”(communicative),则是指术语的定义或解释性文字必须译得通顺易懂,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某种意义上,“准确”与“透明”这两项原则实际上是同一个所指。即是说,我们在翻译过程中紧贴术语原意,采用与文学翻译中“文化移植”相似的手法来处理译文。进一步说,这里所谓的“透明”,是指通过采用“字面对等”的直译法,使译文读者“透过”译文的字面看到源语言文化的特征,而不是指韦努狄在谈论翻译“阻抗”(resistancy)或“异化”翻译问题时所批评的那种“透明”。韦努狄笔下的“透明”目标文本,指的是为英美主流文化所推崇的、可被读者误认为属于目标文化的“流畅”文本。

举个例子:在前面提到的两次讨论会上,我们曾就本词典名称的翻译展开了较多的争论。英语名称*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究竟是译为“翻译学词典”好呢,还是“翻译研究词典”?当时讨论中大致形成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应当将“Translation Studies”这个词译成“翻译学”;第二种意见是将它译成“翻译研究”;第三种意见则是在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译法时,还是把它译为“翻译学”更好。这三种意见的提出,自然各有各的道理。因为篇幅所限,本序不拟对这些道理一一加以转述,而只在此指出以下二点:

第一点,如果采用“翻译学”来译“Translation Studies”,那它主要反映的是“动态对等”的翻译原则,这一译法不能说它不“准确”,但的确有点不够“透明”,因为从它可能会首先回溯到“Translatology”,“Traductology”和“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等词,而不是回溯到它的源词“Translation Studies”;而如果采用“翻译研究”一译,则可以说它既基本上符合“准确”,又同时符合“透明”这个原则。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最终还是决定把它作为本词典中的正式译名,并把它贯彻始终。

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继续阐发一点关于“翻译学”与“Translation Studies”两个概念和术语的思考。这就是我们在此要指出的第二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用“翻译学”一词来翻译“Translation Studies”并非不“准确”。实际上,在特定的语境里,把“翻译学”译成“Translation Studies”,或把“Translation Studies”译成“翻译学”,彼此可能是一个最恰当的译名。“翻译学”中的“学”字,它在汉语里大致有“学问”(knowledge)和“学科”(science)两层意思,如20世纪30年代初林语堂在他的《论翻译》一文中曾经使用过“译学”一词,林氏所说的“学”意指学问,它与今天指学科含义的翻译“学”有区别;董秋斯于1955年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所提出的“翻译学”则是指学科的“学”,因此可以较好地传达“Translation Studies”一词的“学科”含义。

当然,本词典中还有几个同样可以译为“翻译学”的相关词条,即“Translatology”,“Traductology”和“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等。但由哈里斯在20世纪70年代创造的术语“Traductology”在译学界始终没有流行开来;“Translatology”一词的使用也主要局限于加拿大、德国和丹麦等国,在英语

世界多半只用来指那些侧重于语言学方法的翻译研究;“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又常常因为“Science”(科学)一词的使用,而使人误以为“翻译学”即研究翻译的“自然科学”。

英语中之所以会出现用多个关于翻译学的“能指”来表示同一关于翻译的独立学科的“所指”这种混乱现象,主要是由于英语的语言局限,而非翻译学的学科性质所致。换言之,英语世界出现这么多关于翻译学的术语,除了是因为在翻译研究过程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名称才能准确反映出他们各自的特征之外,更主要的原因似乎是英语中缺乏一个概括性高于“Translatology”,“Traductology”,“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以及“Translation Studies”的词。然而在汉语和德语里,就存在这么一个词,即“翻译学”(德语称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它完全可以涵盖上述英文各词的全部意义和用法。由于汉语中的“(翻译)学”和德语中的“(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在语义上较为广泛,意义大于英语中的“science”(一般特指“自然科学”),其“学科性”也强于“theory”,又不致像“-ology”那样让人“望而生畏”,同时又像“Translation Studies”一样能给予研究者较多的解释空间,因而将它与“翻译”结合,就分别构成了汉语和德语中用以指称“翻译学”这门“人文科学学科”的理想名称。

因此,当我们在汉语语境里谈论翻译学的问题时,我们完全可以使用翻译“学”这个既不生僻又恰如其分的术语,来表达英语中需要由翻译“研究”这类学科意味不足、或翻译“科学”这类“科学”意味过浓的词语所表达的概念范畴,就好比德语中把英语的“Literary Studies”(文学研究)说成“Literaturwissenschaft”(文艺学),把“Classical Studies”(古

典研究)说成“Altertumswissenschaft”(古典学),把“Communication Studies”(交际研究)说成“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交际学),把“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说成“Sozialwissenschaft”(社会学),把“Religious Studies”(宗教研究)说成“Religionswissenschaft”(宗教学),把“Legal Studies”(法律研究)说成“Rechtswissenschaft”(法学)一样。

既然汉语与德语一样已有“翻译学”和“译学”这么理想的学科名称,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把本词典的名称译成“翻译研究词典”,而不是“翻译学词典”或“译学词典”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Translation Studies”一词沿用了霍尔姆斯于1972年阐发的观点,以凸显它作为“翻译研究学派”(或“文化学派”、“操纵学派”等)与其他学派如翻译的语言学派或科学学派有所不同的特殊含义,如果把它译成“翻译学”(或“译学”)词典,则有可能丧失这层意义;二是,我们是在翻译而非创造相关术语,而在翻译术语时只有采用准确但较为“透明”的方法,才更有利于我们对外来术语和概念的借鉴和利用;三是,本书属于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而丛书的两位主审王克非和朱志瑜先生均赞成这种类型的“忠实”与“对等”,我们采用这样的“透明”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配合主审的意图,以使整套丛书的风格基本趋于一致。

当然,对于“透明”原则的贯彻,有时也有例外。有些术语在英语原文中也许不难理解,也不难接受,但如果按照字面意义把它对译成汉语,恐怕实在难以理解和接受。遇到此种情况,就只好稍稍偏离一点“透明”,而适当增加一点“动态”释义,使费解的源术语在译文中变得生动起来。例如“Thick Translation”这个术语,如果照直译成“厚译”似乎很费解,

如果稍作扩展把它变成“增量翻译”似乎更为可取,因为它在定义上是指通过在目标文本中增加注解、词汇表以及序言等解释性材料的翻译,这种翻译“把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及语言环境中”,使译文篇幅增长而变得更易理解。再如“Generalizing Translation”这个术语,其严格的“透明”翻译大概可以是“概括性翻译”,但稍作变动把它译成“宽泛化翻译”,则似乎更理想,如此等等。

在词条翻译过程中如何贯彻“一致”原则的问题也是一个特别值得讨论的问题。所谓“术语”是指某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通常术语的语义单一,定义相对精确而固定,使用起来往往不受语境的限制,例如语法用词“主语”、“谓语”、“宾语”和语音学术语“音素”、“音位”、“音调”、“音标”等等。译学术语自然也大致如此。但如同其他领域中时常发生的情形一样,有些译学术语也可能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具有超出一种以上的定义和用法。这给翻译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问题:如果采取一词一译,那可能会反映不出源术语各个不同义项的面目,而如果采取一词多译则可能会引起术语混乱,无法与源术语保持一致。我们基于对“一致”原则的整体考虑,最终对各个具有不同用法的源术语还是采取了一词一译的基本做法。例如“faithfulness”、“fidelity”、“loyalty”这三个术语,一般词典在解释它们作为译学用词时往往都不加区分地译成“忠实”。但在源文本中,它们毕竟是三个不同的用词,如果笼统地译成同一个词即“忠实”,可能会模糊甚至扼杀了可能存在于原文中的细微分别。事实上,虽然“faithfulness”与“fidelity”这两个英语用词在基本意义上并无太大差异,但“loyalty”一词却由诺德增加了一层“道德”含义,因为诺德认为对原文保持“忠诚”是交际过程参与者人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道德”

原则。为了使译名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这些可能的区别,以及为了贯彻我们的“一致”原则,上述三个英语用词不论出现在哪里,就都分别译成了“忠实”、“忠信”与“忠诚”,彼此互不替换。

有一些术语属于互为关联的术语对或术语丛,翻译时无疑需要考虑选词上的关联性和一致性。例如: Covert Translation [隐型翻译], Overt Translation [显型翻译], Overtranslation [超额翻译], Undertranslation [欠额翻译], Documentary Translation [文献型翻译], Instrumental Translation [工具型翻译], Operative Texts [运作型文本] (Appeal-focused Texts [感染型文本]), Expressive Texts [表情型文本], Informative Texts [信息型文本], Multi-medial Texts [多媒介型文本], Observational Receiver [观察型接受者], Participative Receiver [参与型接受者],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词对词翻译], 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 [意对意翻译], Didactic Fidelity [说教忠信], Historical Fidelity [历史忠信], Exegetical Fidelity [诠释忠信], Dynamic Fidelity [动态忠信], Constitutive Translational Conventions [建构性翻译常规], Regulative Translational Conventions [规约性翻译常规], 等等,对它们的这种翻译处理,反映出我们对于关联性和一致性原则的整体考量。

至于“一致”或“一词一译”原则的例外情况,则仅仅限于对极少数译名的处理,这类术语包括“text”、“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Version”等等。例如,“Text”一般译为“文本”,但当它特别强调作为语言单位的意思解释时却译成“语篇”;“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以及几个相关术语均采用“传意(翻译)”与“交际(翻译)”两种译

名,以包容港澳台地区和内地译界在这一用词上的不同;唯一一处因义项不同而采用不同译名的术语是“Version”,该词条有两个义项,分别采用“改本”与“改译”两种译名,原因是:义项1把“Version”用来指“偏离源文本太远而无法称为‘译本’[Translation]的目标文本”,义项2则指勒弗维尔用作“Interpretation”(解释)翻译策略之下的两种子类型之一,与“Imitation”(拟译)相对,强调的还是一个“译”字。

此外,有些常见术语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译名,例如“Source Language”(SL)过去常译为“原语”、“原文语言”、“原作语言”、“原发语言”、“出发语言”或“译出语言”,“Target Language”(TL)则译为“译语”、“译文语言”、“译作语言”、“译入语言”或“归宿语言”等等,虽然这些译法总体来说并无不妥,但一个原文竟然引出如此多的译文,难免引起混乱。在此次翻译中,我们按照“准确”、“透明”以及“一致”的原则,分别把它们确定为“源语”和“目标语”,同时还相应地把“Source Text”(ST)译为“源文本”、“Target Text”(TT)译为“目标文本”。希望这个译法能获得译界同仁的认同,从而逐步避免出现以上那种译词与原词在术语以及概念表述上的不对应。

最后,有几个技术层面的问题需要予以简单说明:

1. 每个词条中的中心术语均以不同字体排出,以方便查阅。用作交叉参考的术语,如出现在“见”、“参见”或“另见”等字眼之后,会把英语原词排列在先,中文译名用方括号排列在后;如出现于词条正文的表述文字中,则会用不同字体把相关中文译名排列在先,英语原词用方括号置后;希望这么做可以起到突出交叉参考词的作用。

2. 词条中出现的外国人名,均以中文译出,并在名字首次